

历代名帖技法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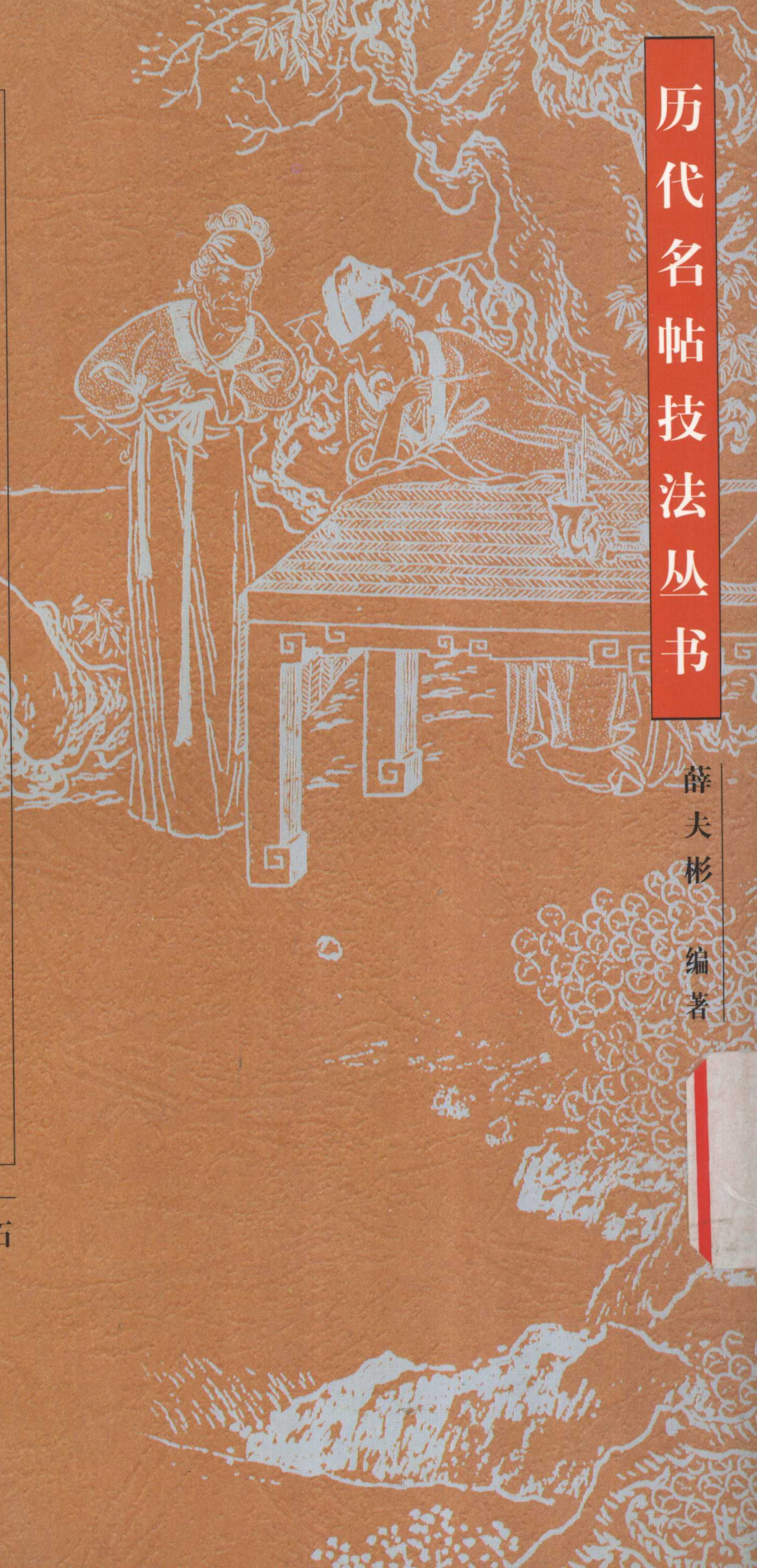
薛夫彬  
编著

# 王羲之之行书导学

行书用笔间架法

艺术指导 欧阳中石

华夏出版社





历代名帖技法丛书

# 王羲之之行书导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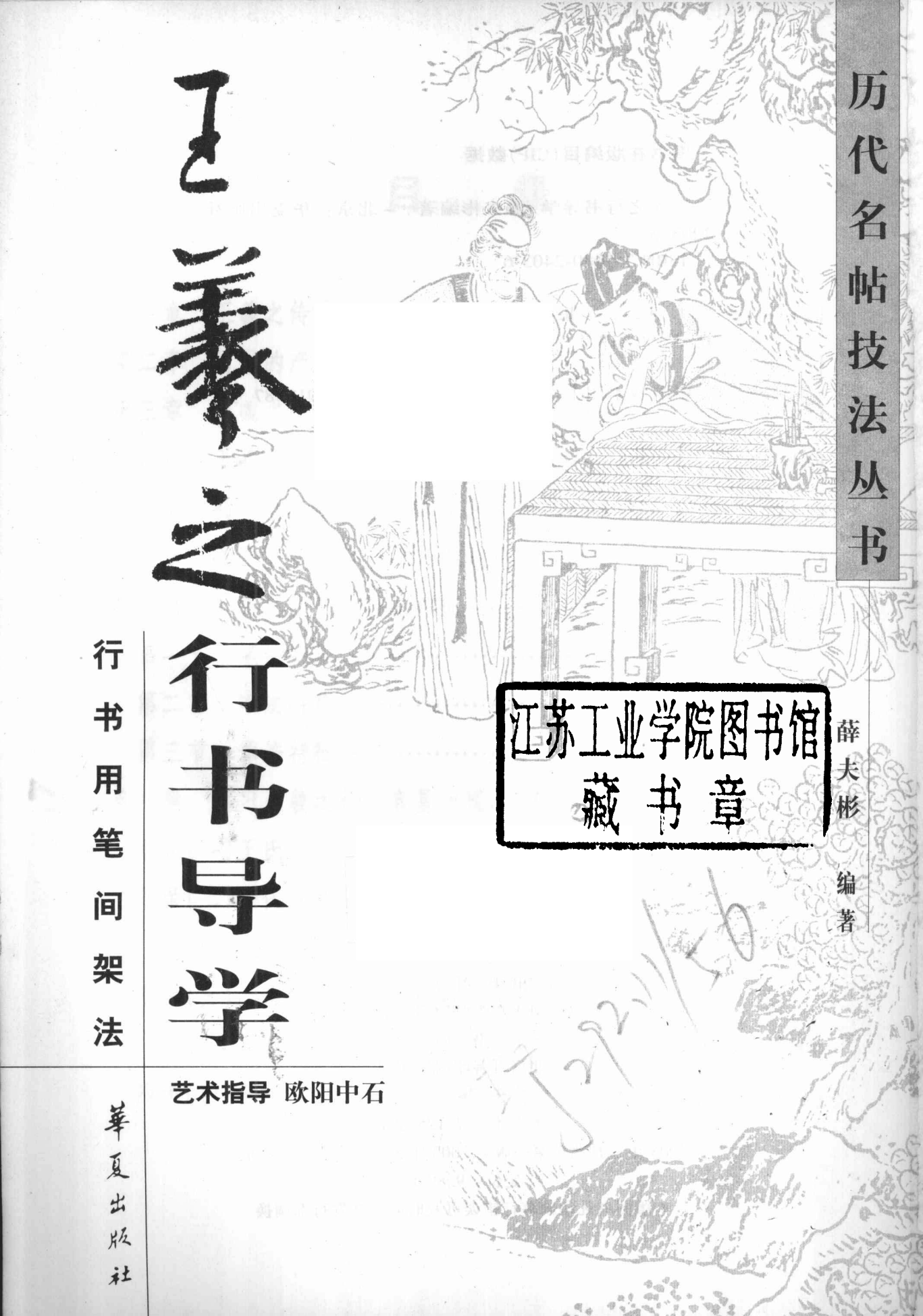
行书用笔间架法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薛夫彬  
编著

艺术指导 欧阳中石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羲之行书导学/薛夫彬编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3

ISBN 7-5080-2403-6

I. 王... II. 薛... III. 行书-书法  
IV. J292.1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3387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

16开本 7.125印张

2003年3月北京第一版 2003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价:9.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前 言

汉字沿革的历史，自汉末“行书”出现以后即完成了字体嬗变的过程。至此，汉字书写的篆、隶、草、楷、行五体齐备，再无新的字体产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字发展的结束，而只是一个框架的建构。汉字所具有的艺术内含和独特魅力，使它自初创伊始即引导华夏子孙开始了另一部历史——书法艺术史的拓展。近三千年的探索，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审美与创造力。于是，我们得以纵览历代书法家以他们的才情素养，展示他们的理解与构想。对各种字体进行美的开掘，创造出了异彩纷呈的风格与流派，挥写了一部宏远博大，瑰丽神奇，绵延至今，自立于艺术之林的书法艺术史卷。

展开这部史卷，我们看到各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代表书家。他们各擅胜长如群峰林立。每个人都对书法美的诠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渊源有自，代代相传，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蔚为大观的书家之伍。在这一群体中，有一位如奇峰突起、雄视古今的人物，他就是被尊为“书圣”的东晋书法家——王羲之。

历史上学习和研究王羲之的书法家，自晋以降，代不乏人。他们各有领悟，成就斐然，真知卓识不时见于著录，对后世启示良多。遗憾的是论述多散帙零落，不易检选。本书拟将历代学王经验和成果做一简约勾勒，并将自己学王心得附骥于后。自知乖漏难免，但前车之鉴或许有益于初学。故教事之余，检点笔记，梳理连缀，遂有此册。可自慰者，所引图文皆选自历代经典。而研习实践之体悟，不敢有半点敷衍潦草之处。探望知书者明察，亦愿就教于方家。

# 目 录

第一章 王羲之传略 .....	(1)
第二章 行书的产生与王羲之的出现 .....	(3)
第三章 王羲之行书的成就及其影响 .....	(5)
第四章 王羲之行书的成因 .....	(8)
第五章 初学行书以王为法的原因 .....	(11)
第六章 临习王羲之行书的步骤与要求 .....	(12)
第七章 王羲之行书的技法特征 .....	(14)
第一节 笔法特征 .....	(14)
第二节 字法特征 .....	(31)
第三节 章法特征 .....	(59)
第八章 学习王羲之行书容易出现的问题 .....	(73)
附录(一)王氏一门传世行书作品简介 .....	(75)
附录(二)历代收藏王书作品概况 .....	(87)
附:王羲之及其传人作品目录 .....	(88)
附录(三)历代书论中关于王羲之传承一脉及当取法 王羲之语录简辑 .....	(90)
附录(四)王氏一门及其传承一脉书家行书作品图版 .....	(96)

## 第一章 王羲之传略

王羲之，字逸少，小名吾菟。出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即公元303—361年，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北），西晋末年移居江南，晚年定居会稽（今浙江绍兴）。王羲之出生的家族琅琊王氏，至少从汉代开始就已是著名的官宦世家。五世祖王吉，曾为汉谏议大夫；曾祖王览，西晋时官至光禄大夫；览之兄即世传《二十四孝》中以“卧冰求鲤”闻名的孝子王祥，曹魏时官至太尉，西晋初年，迁太保，进爵为公；祖王正官尚书郎；族伯王成，为“竹林七贤”之一，官至司徒；另一族伯王衍，累官司空、司徒、太尉，是“中朝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

其父王旷曾任丹阳和淮南太守，是个很有见识的人。《晋书·王羲之传》说：“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可见他对东晋王朝的建立，曾做出过重大贡献。当时辅佐司马睿、支撑东晋的王家代表人物是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和族伯王敦。王导位至丞相。王敦原是晋武帝司马炎的驸马，位至中书监，广武将军，元帝时拜为大将军、扬州刺史，握有兵权，当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王羲之就是生长于这样一个名门望族。

《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幼讷于言人谓之奇”。十三岁时，去见吏部尚书周颙，“颙察而异之。”故引起人们刮目相看。长大以后以鲠直著称，握有重权的从父王敦、王导亦都对羲之非常重视。王敦曾对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主簿指阮裕，时有重名。阮裕亦视羲之与王悦、王应为“王氏三少。”王导尝感叹有些子侄“不令”，而独重视羲之，欲委以重任。但最能说明羲之性格和气度的还是那个脍炙人口的“东床坦腹”的故事。据《晋书·王羲之传》载，大约在他二十岁那年，太尉郗鉴派他的门生向王导求一个女婿，王导让他们自己到东厢王家子弟中去挑选。门生看后回禀郗鉴说：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而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以致后世“东床”竟成为“女婿”的代词。郗夫人名璿，字子房，亦工书。

成人以后的王羲之，由于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以及家庭出身和教育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和生活充满着各种深刻的矛盾，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仕宦和隐逸的态度上。当他的好友殷浩参予朝政，欲重用他时，他回信说：“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向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

王羲之生平对于仕途虽无兴趣，然于国家安危之际，颇有器识，发出“宜国家威德固

当不同于凡使”，“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的誓言，并在任所做出了建树。

虽然心情矛盾，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官宦生活中渡过的。他起家秘书郎，后来征西将军庾亮很赏识他，请他参军，又迁长史，后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和临州太守、吴兴太守、永嘉太守。最后，约在永和六年或七年，由护军将军改授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直至晚年不仕为止。

《晋书·王羲之传》记其：“有七子，知名者五人”。其五人是：长子玄之，早卒；次子凝之，字叔平，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妻谢道蕴，为谢奕女，著名才女，亦工书；微之，字子猷，官至黄门侍郎；操之，字子重，历任侍中、尚书、豫章太守；献之，字子敬，官至中书令，书与父羲之齐名，世称“二王”。一女不知何名，嫁于刘畅，生子瑾，官尚书，太常卿；另生一女嫁谢奕之孙谢瑛，生诗人谢灵运。

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与诸友宴集于山阴之兰亭，作《兰亭序》以申怀抱。《晋书·王羲之传》称其书法为“古今之冠”。不仅见重于当时，后世更尊之为“书圣”，载誉千年，至今不替。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成就最高和影响最大的书法家。

## 第二章 行书的产生与王羲之的出现

艺术源于社会实践。以书法而言,做为其载体的汉字,体式演变的直接原因是实用的需要。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使当时大汉疆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沟通。纵观书法史,我们可以看到文字在这个时期兴衰更替和剧烈变革的轨迹,各种字体相继流通或始创。篆书时有应用,隶书已臻鼎盛,章草成熟流通,楷书已露雏形,行书草创初成。正如康有为所说:“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因此,我们说汉代是书法集大成的时代。一个朝代完成了如此浩瀚伟大的工程,我们不能不赞叹汉代先民的智慧和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行书正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汉末行书的出现使汉字的书写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的捷便易识,灵动晓畅极大地提高了汉字的实用和观赏价值,也使书家们乐于使用和推广它。从历代流传至今的大量墨迹看,其它各种书体皆有盛衰更替,而行书一经出现至今不衰,一直受到书家乃至文人雅士的最为直接的关注与偏爱。因此,行书是使用最广泛、传世墨迹最多、风格面貌最为丰富的字体。

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些遗传书迹的学习、研究与应用,我们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即与其它各种字体比较,行书是最难规范的字体。同一个字不同书家有不同的写法,甚至同一书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其它书体各有规范:篆有篆法,隶有隶法,楷有楷法,草有草法。惟行书无法可依,以至自有行书以来,未有专论其法者。无法而能如此流行,面对这种现象,惟一的解释,或许是惟其如此,才使行书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和抒情表意的艺术功能;同时也为书家的创作发挥、展示个性提供了无限广大的空间,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因此,可以说行书是最具创作潜质而内含丰富的字体。

前人对“行书”概念的界定众说纷坛,要如:张怀瓘、姜夔、苏轼、宋曹、刘熙载、周星莲、康有为等人的著述中皆有涉及,但角度不同,各有侧重,繁略互见而极不统一。其中我们认为唐代张怀瓘为行书所下的定义较为妥贴和完整。他在其所著《书断》中写道:“行书者,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又在《书议》一文中说:“夫行书,非真非草,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两相补充,既阐明了行书的特点,又做了具体分类,后世论者多遵此说。惟清人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修正苏轼“楷如立、行如行、草如走”的说法,谓“楷如立、行如行、草如奔”。以动作喻书法,颇有新意,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行书。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发现“行书”只是真草两体之间的过渡写法。做为一种独立的字体,它的内含更多的是在与真、草两种字体比照中确立的,兼容性是其字体独有的本质特征,似乎只有“离方遁圆”、“务从简易,相间流行”可以做为区别于其它字体的依据。但是这一点却是自有文字以来,历代先民一直都在实践中追求的。从历代书刻图录上我们看到,大篆时期的楚简帛书,小篆时期的诏版权量文字,隶书时期的简牍书法都符合“简易、流行”的特征,也可以印证以上观点。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字史上,每一种规范字体流通使用的同时,都有相对于它的简易、便捷的草化流行写法出现。这些写法的日常应用和不断完善传递出社会需要的大量信息,预示着新的字体变革的来临。即以汉代简牍书法为例,其用笔的顺势一反隶书的逆入,即为魏碑字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技法准备。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是简易流行的草化写法,促进了中国文字的一次次变革。同时也说明“务从简易、相间流行”的写法不自汉代始,只不过汉以前没有“行书”这一概念罢了。按照一般习惯说法,我们可以认为行书是楷书“简易、流行”的写法,是对楷书法度的草化与突破。明确这一点对我们理解行书,把握行书甚至认识书法的演变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期,正是汉末六朝这个中国历史上动荡纷争、战事频仍、割据交错的混乱年代。也正是书法从自然创成,渐变到艺术自觉的时代。

政治上的动荡必然导致种种社会矛盾冲突的尖锐和激烈。魏晋时期,文人们渐渐失去了“独尊儒术”的信仰,而以老庄哲学为核心的“玄学”思想逐步形成并流行开来。“无为”、“自由”、“来世”、“永恒”的自我追求成为时尚。“人生如梦”、“对酒当歌”、“我行我素”、“卓而不群”的思想行为则促进了个性的张扬以及人格、气质的养成。因此,处于这一时期的文人中涌现了如:诸葛亮、司马相如、陶潜、三曹、二王、竹林七贤……等等大批极具个性风采、才华横溢的优秀人物和诸如:“囊萤”、“映雪”、“刺股”、“悬梁”……,这些特立独行极有教益的典章故事。应该说是时代孕育了这些名垂史册的人和事,这些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状况、思想方法和人们的审美追求。书法艺术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酝酿形成了“魏晋书风”,开启了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同时也造就了王羲之这样一位超迈古今的“书圣”。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为我们描述了晋人的书法(行草)情结,我以为中肯而精到。他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道:“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魏晋人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一件事物的初创必然是幼稚的,需要后继者去完善它,使之成熟起来。行书到了魏晋时期正面临着这样的景况,在这样一个注重人的“觉醒”和“思想解放”,追求“风骨”与“不朽”的背景下,王羲之做为书法艺术方面管领时代的代表人物,可谓生逢其时,他的出现与成功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

### 第三章 王羲之行书的成就及其影响

行书自汉末刘德升草创之后,经由他的两个学生钟繇与胡昭传习,虽“务采其美”,渐次流行,但只见著录记载,未见作品传世。直至东晋王羲之的出现,才使行书兴盛成熟起来,显彰光大形成规模,逐渐为世所重并风靡开来,成为晋以后历代书家心摹手追无不钟爱的字体。因此,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功绩是无可替代的。

王羲之行书的成就在于,他把出现不久处于萌芽状态的行书,推进到日臻完美与成熟的高度,同时将书法这一中华民族的审美形式和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使这一门独特艺术的内涵更加丰富博大,影响日益深广,而书法家从此成为社会关注的个体。这固然是因为行书所独具的艺术性、实用性、可塑性和普及性所诱发和吸引,同时王羲之的个人艺术魅力和创造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晋以后书家多宗其法或受其教益这个不争的事实,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王书的历史功绩。试想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能在一个领域里风标独占,长盛不衰,以至成为书法之外的各个阶层也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象征性人物,该有何等的建树和魅力。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

遵循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做为一种新兴字体,行书应有发生、发展、逐渐成熟的过程。可惜王羲之以前的行书已无遗迹存世。评论所及亦多简括不详,例如:关于刘德升的行书,据记载仅有“丰瞻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等几句话的表述。至于其传承者钟繇、胡昭不过“钟瘦胡肥”四字而已,使我们无法探知行书创成的究竟,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我们想随着考古等资料的发现,这一段空白应会被后来的研究者充实起来的。从现存史料来看,关于王羲之,则自其所处之东晋开始,凡有论书篇章几无遗漏,赞美褒扬无出其右者。如《晋书别传》称“羲之……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之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其所措意皆自然万象,无以加也”。评价之高可以想见王羲之在当时已是声名显赫的大家了。使其更趋鼎盛的有力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他的《王羲之传论》里褒赞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飞露结,状若断而不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其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何足论哉”。推崇偏爱之情,溢于言表,以皇帝身分对王羲之做了充分肯定。这对王的“书圣”地位的确立起到了一言九鼎的作用。皇帝一呼群臣百应,于是唐李嗣真在他的《书后品》中极赞之曰“右军正体……可谓书之圣也,行草杂体……可谓草之圣也”。张怀瓘《书断》则对王羲之的业绩做了高度而具体的评价:“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个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功必中庸。英气绝

伦，妙节孤峙……精研体势则无所不工……真行研美，粉黛无施则逸少第一”。曹勋则认为“逸少书自六朝以降一人而已，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这是因为“逸少一生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有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试举显名今世，遗迹仅存者拔其美善，指其瑕疵，庶取舍既明则趋向可定矣”。（项穆《书法雅言》）。可见王羲之的书法已经成为衡量晋以后历代书家优劣的标准，成为后世学书的典范。

王羲之行书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顶峰，是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没有这样精审流美、简括飘逸的写法，至少从存世作品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所以清代理论家刘熙载评论他“功屈万夫，韵高千古”可说是颇有见识的概括。正如启功先生所指出的：“王羲之的书法无论古今哪家哪派的评价如何，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总是客观存在的。”（启功跋《万岁通天帖》）

魏晋时代造就了一批特立独行的卓绝人物，王羲之就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从青年时代“袒腹东床”到后来的“抗行钟张”，我们似乎领略了一位耿介特立的艺术家风范，而当我们读到“仰观俯察”，“临文嗟悼，死生虚诞，感慨系之”这样的抒发时，又分明看到了一位悲天悯人，真诚善对人生的智者形象，这种真诚一旦与精湛的技艺结合，运用到艺术创作上便诞生了冠绝古今的“逸少体”和《兰亭序》。由此也翻开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新篇章。

魏晋人讲求风韵独标，各出其妙，王羲之的个性恰正体现了这种风范。明人项穆说：“右军多优，体裁独妙，书不入晋，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诂称逸品？……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采攸焕，正奇混成也。”南朝袁昂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不复端正者亦爽爽有一种风气。”这“独妙”的“神采”和“爽爽”的“风气”正是晋人所崇尚的“韵”，亦如周必大所言“晋人风度不凡，于书亦然。右军晋人中之龙虎也”。

王羲之书法所表现出的“韵”是多方面的，先来看古人的评价，《晋书》说他“风骨清举”；梁武帝说他“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孙过庭则曰：“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于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张怀瓘曰：“真行研美……其道隐而意深”；刘熙载说：“静而多妙”；周星莲评曰：“变化迷离”；尤其唐太宗极言之“尽善尽美”，可以想见其对王书的心悦诚服。

历代评论家并非没有指斥之论，如韩愈曾有“羲之俗书趁姿媚”句。凭心而论，韩愈所说未免偏颇，且不说其后来赞同者寥寥，我们以为即便“姿媚”又有何妨。“姿媚”未必就是俗书。我们认为，以王字为“俗书”的人恰恰说明他对王书缺少真正的认识，这其实倒是学王不得法者极易走入的误区。“看似寻常最奇崛”，正是王书的可贵之处，故韩愈的一家之言无足征信。倒是在书论中对王书颇为首肯，褒赞有加的张怀瓘认为“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颇值得重视，因为我们由此可以探知唐人的品评趣味和标准。我们认为王的《初月》、《行穰》、《寒切》、《此事》等帖，均可称草书上乘之作，不知张所见为何帖，或许是《十七帖》之类的小草不够姿肆开张，给了他如此印象。总之，我们为张的说法感到惋惜，但仍愿详加审视，以求深解，而且可以等到将来再谈。

右军书法的魅力在于把玩的时间越长，越觉其妙不可言，其“道隐而意深”，正是历代书家费尽心思，孜孜以求的原因。比如风格上，其清雅中蕴含的雄逸与隽永，笔法上在简

净中出现流落的变化与力度，结字上平和中显现的欹险与匠心等，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王羲之行书的博大精深和与众不同的风范。

因此，晋以后书家多以王为法式，这固然有其约定俗成，随流实用的一面，但更主要的还是王书的博大魅力，完全可以使其成为法度。翻检史迹每每见到学王者因选取角度不同而各有领悟，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书法风格。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的学书者更要深加体味，务须思考的。理解这一点对我们今后的创作将会有重要意义。赵孟頫说“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学之，便可名世。况兰亭是右军得意书，学之不已，何患不过人耶”。（《定武兰亭跋》）可谓经验之谈。

明代理论家项穆在他的《书法雅言》中一一列举了历代书家学王的得失，读来颇有趣味，也足见王羲之影响的深远与广大。兹录下或许能给学书者一些启示。（参见历代行书名作图版）

“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发之筋而鲜安详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气而失之竦窘。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旭素得其超逸之兴而失之惊怪。陆徐得其恭俭之体而失之颓拘。过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俭散。蔡襄得其密原之貌，庭坚得其提顿之法，赵孟頫得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抚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宗颜李，米芾复兼褚张，苏似肥艳美婢招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芾若风流公子染患痲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之。择长而师之，所短而改之，在临池之土玄鉴之精尔”。项公所议虽过于简括甚或偏颇，但确是知书之论。不管这种评价方法对艺术创作、风格流派的探索与追求是否公允，它至少说明：

1. 历代代表书家受到王的直接、间接影响，几无例外。
2. 历代论书如果试图绕过王羲之几不可能。
3. 王书已成为行书的相对标准。以此入手，方可得法入道，不至误入歧途，几成定论。

以一家之书而影响如此深远广大，足见作为书圣的王羲之，其历史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其书法美的创成是足供后人师法、研究和赞颂的。而作为书法艺术的传承者，不论其观点如何，追求是什么，对王羲之的认知和了解都应是不可或缺的一门功课。这一点即使对于视王书为“俗书”，视学王为“保守”的“前卫书家”们也是应该颌首的，但这需要冷静、客观与严肃。



## 第四章 王羲之行书的成因

那么王羲之的影响千年不衰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王羲之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和影响呢？总结前人的论述，我们认为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 家学渊源，修养深厚。王羲之出身一个声名显赫的官宦世家，其亲友中不乏博学才俊之士。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先天具备了三方面不同于常人的优势。第一，他一定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第二，他有条件接触到当时的名贤高士和名作佳构；第三，在他所处的环境里必然能够感受到当时各方面文化信息的冲击。有此三个先决条件加上他个人的资质与潜能，也就必然使他会不同凡响的创造与业绩。

关于家学，史多有记，自周至汉及晋，王氏一门，文官武将代代相传，名高位重。这在当时就意味着，子弟们的教育问题必然会受到重视以传家继业，这一点姑且不论。即从书学而言，羲之的叔父也是他蒙师的王廙，就是“能章楷，谨传钟法”，“自过江东右军之前唯廙为最”的名家。其它宗人如：王导、王洽等皆有书名，且是书史上有传的名家。至于其父母，曾藏《笔论》于枕中，想等到王羲之长大以后再传给他的故事，则证明他们两位同样是知书守道之人。其父王旷《书小史》说他“善行隶”，可见也是书道中的佼佼者。

与王旷有中表亲戚关系的著名女书家卫铄即卫夫人，则是王羲之的另一位老师。她实力雄厚，名重当时，颇具影响。可谓书坛中的巾帼人物。至于慧眼独具，执意偏选“坦腹东床”的羲之为婿的郗鉴等，更是东晋时代权倾一时的名门望族。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王羲之自幼耳濡目染，其所受到的熏陶和教育，自然非常人所能比。起点很高，自不待言。同时，我们从包括谢安等在内，有四十一人参加的“兰亭”雅集中可得知，王的周围有一大批文人墨客与之往来。从他的“兰亭”诗和与会者推他做序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修养全面，才华出众，威望很高，颇受群贤爱戴，是当时文人中的领袖人物。正是为这次聚会所做的《兰亭序》，使他得以名垂青史。其文被收入选材颇为苛刻严谨的《昭明文选》和《古文观止》。而他起草此序的墨迹被历代奉为“天下第一行书”。他本人则成为书法史乃至文化史上，名冠古今的代表人物——“书圣”。

2. 独行特立，精绝尚变。如前所述，王羲之所处的时代正是书法史上变革的年代，各种书体在这个时期杂用并举，做为书坛代表人物的王右军自然具有这方面的修养和表现。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羲之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之法”。羊欣也说：“羲之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康有为分析道：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作草如真，作真如草，为百世学书人立极”。孙过庭亦云：“元常专

工于隶书，伯英独擅于草体，彼之二美，羲献兼之”（《书谱》）。王献之曾劝其父改体，并分析原因道：“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可见王羲之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增损古法而标领千秋的。

王羲之自己曾有这样的表述：“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乃于众碑学习焉”。这段话使我们看到了王右军取法乎上，视野广阔，转宜多师，求知若渴且善于学习的心态。但是话中所谓“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一句颇为费解。以王的修养与学识应该知道蒙师引其入道的作用，其对乃师如此偏执的见解，颇不符合他的身份与地位。正因为这一点，有批评家怀疑这篇文章的真伪，认为是伪托右军之作。

但是，我们仍然通过以上的评论与记述，感受到一种启示：博采众长，广纳博收，不断进取的好学精神，是使王羲之成为后世楷模的前提，也是一切成功者必需具备的素质。

古人云：“厚积而薄发”。王羲之广泛的学习与积累不是为了做一个只知继承而泥古不化的“书奴”。自幼见到父亲所藏《笔论》即窃而读之”，并被卫夫人夸赞有“老成之智”、“将谓大能”的王逸少在艺术上是个不太安分的人，他的“备精诸体”是为了“生发”，为了“自成一家之法”。康有为道破了逸少天机：“右军所得，其变可知……唯善学古人而变其面目”。深厚的积累为他以后的创作做了充实的准备。他那精熟的驾驭笔墨的技巧和从心所欲结构形字的能力，以及雄视古今的气概，为我们留下了“不厌百回读”的大量墨迹。《岑宗旦评书》曰“语其众妙，足以争造化者，羲之也”。后人评羲之善变即源于他的善学和博学。学的多了，自然“临事制宜，从意适便”，融会贯通，流露出不同一般的意趣与韵味。总之王羲之在笔墨承传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因此，能博采众长，凛凛有神，可以说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变化是一切艺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王羲之书法的变化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认识，如：用笔、结构、体势、风神等，甚至其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一部作品中相同的字，都有着大不相同的变化，这一特征我们将在王羲之的艺术实践中详做分析。

前面讲过王羲之的最大成就是把行书推向成熟与完善，并使之流行至今，而这一点正是其博学与善变的成果。

《晋书·别传》评王羲之书“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其所措意备成一家”。孙过庭《书谱》则具体分析其变化道：“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若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析，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夫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规模所设，信由目前，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闾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我们欣赏王的书迹也常有意外发现，篇篇不同，字字有变，融情于书“无不曲当妙处”。确有超迈群贤，神功自现的气概。因此可以说是王羲之使书法更具艺术特质与表现力，成为构成中华文明特有的，国人极为珍视的“国粹”之一，这也正是他历来受到人们尊崇爱戴的原因。

3. 皇家推崇,时代使然。王羲之书法自他所生活的东晋时期始,即已极富盛名并为世所珍。当时的人们以得其一纸为荣幸,学书者以学其书体为时尚。从前面所引文章来看,称其为当时甚或晋以后领袖书坛的风云人物,当是令人信服的盖棺之论。而使其屹立书坛的主要原因,除前文所述的社会背景、书法时尚、个人才华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不可或缺。那就是晋代官方及以后历代皇帝的赞许和推崇。《晋书》与《晋书·别传》对其人其书辟有专章。而后来的梁武帝集王成癖,唐太宗撰文褒扬并命名臣仿摹,清乾隆设堂专赏等等史实,都印证着王羲之在历代帝王中所受到的尊重与推崇,这里我们不妨援引王玉池先生在《王羲之》一书中关于历代收藏王书情况的研究与统计。

“南朝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中书侍郎虞和奉诏撰《论书表》,记述刘宋内府收藏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迹共767卷。其中新收入未鉴别的作品120卷。

唐张怀瓘《二五等书录》载:梁武帝时内府共收王书15000纸(至梁元帝时大部分被烧毁)。

唐贞观年间共收右军书128卷2290纸,其中真书八卷50纸,行书四十卷240纸,草书八十卷2000纸,唐肃宗乾元年(公元760年)增至218卷。

宋徽宗宣和年间内府共藏王书243卷。”

如此规模的搜集与收藏,只有在官方即朝廷的统一组织策划下才有可能进行,只此一斑即可见王羲之在历代皇家心目中的地位,而在唯上是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皇权社会里,王羲之以他的实力和影响被尊为“圣”,其书法风行,千载不衰,自然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王羲之生活的魏晋时代,为他特立独行、展示自我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历代官方对文字书写的重视与倡导又使他的艺术得以播扬传承。因此可以说王羲之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因而成就了他流芳百代影响至今的书法艺术成就。

## 第五章 初学行书以王为法的原因

如前所述,行书是各种字体中最难于规范,最具可塑性(不确定性)的字体。因此,学习行书首先遇到的就是以什么为法,从哪家入手的问题。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了解到王羲之行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因此以王为首选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我们说是“首选”而不是惟一的选择。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两代也不乏以颜、米、赵、董为宗的书家。时至今日,由于现代传媒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广泛地见到各家各派的经典之作。学书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做出任何选择,应该说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仍然提倡以王为首选呢?这是因为:

1. 遵照“取法乎上的原则”。王羲之行书既然在历史上已有“行书第一”的定论,它代表着行书的正统,并被历代名家认可,学王不会导入歧途,不至误人子弟是可以肯定的,这是被历代无数书家的成功经验所证明了的。

2. 王字雅训清丽、超拔自然、不激不厉、不乖不野,为绝大多数人所钟爱,可谓雅俗共赏的经典。谚云:“热爱是成功的起点”。大凡美好的事物,人们乐于接受它,了解它,容易产生共识,因此也就易于学习它,把悟它。

3. 由于行书法度难于规范,因此必须选一相对完整精到的代表书家的作品为范本,从丰富的笔法和字法中,可以体悟行书的规律和魅力。无疑王书具备这一条件,足以为法。

4. 历代学王脉络清楚,成就斐然。参照历代名作,学其法者不易僵滞轻滑,可向多方面发展。精其一点既可成家。

5. 王羲之流传作品丰富,便于学习参照,易于比较,故学起来方便。例如:《集王圣教序》和《兰亭序》等,而有些书家作品很好,但字数少,对初学来说参照系数小,不易把握。如《韭花帖》、《中秋帖》等即不适于初学者。

6. 学书的重要规律和方法是由临摹入手。行书也不例外,既然王书有以上优势,那么以其做为临习范本是顺理成章的必然选择。



## 第六章 临习王羲之行书的步骤与要求

本节所谈步骤就是选帖问题,如何更好地把握王书的风格,进而理解行书,进行艺术创作。正常的规律是无论学习哪一门艺术都要循序渐进,草率无序或急于求成,结果是事倍功半或一事无成。现实的经验是,基础打的越坚实,发展的可能性越大,选择的方向会越来越宽泛,学习的兴趣会更高,实践起来会更容易。不贪图一时痛快,不妄想一蹴而就,这是必须明确的认识。因此,根据情况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是必要的,总结古今的学书经验,我们认为学习王羲之的行书,在选帖时应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1. 入手:当选《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此帖点画清晰利落,结字秀逸典雅,较易入手。当注意其用笔的简净、峭利、折转变化,不拖带柔滑。结字平中寓奇,生动自然,欹正开合,灵动多姿。尤其可贵的是其所收字数多、变化大,所以便于参照选择。惟因系集字,故行气欠通畅,章法少跌宕起伏之势。因此,是练字练笔的好范本,而章法谋篇则需另选别帖。

2. 精审:掌握了《集王圣教序》的笔墨基础以后,继临《奉桔帖》(图版)、《丧乱帖》再至《兰亭序》(图版),为练习灵变的范本。《奉桔帖》、《丧乱帖》二帖,因其字数少,易于分析比较,章法上也较易把握。此二帖当注重其字与字之间断与连的酣畅气息和用笔的微妙变化,再临《兰亭序》就有了初步经验。《兰亭序》迹近行楷,但行笔畅达合度,点画灵动,富于变化。其相同字的不同形态自然多样,无丝毫造作之态,通篇和谐,一气呵成,随意适便但不失法度。做为行书的首选经典,不但要学其技法还应对其神韵细审详察,体悟玩味,必将受益无穷。

3. 强化:选择动势较强的《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图版)做行书的强化练习。此类作品酣畅淋漓,用笔劲健,率意连绵,节奏明快,需要较强的笔墨控制能力和精熟的造形技巧,一般应以酣畅、通脱为临习要点。使前面两步更加巩固,在取势上更具自然、灵动,似不经意而意在法中的感觉。

4. 融草:可临《寒切帖》、《初月帖》和《得示帖》(图版)。行书中融入草书,是王字的一大特征。章法生动灵活,讲究气息的通畅,极富感染力。妙在放笔直书但不离规矩。因此,要求掌握草法,笔墨精熟。这是有了前面的准备后才能够完成的。也可参照大令《中秋帖》以感受行草之势。

5. 异势:可临《姨母帖》,此帖是王书诸帖中有异常面貌的一种。其用笔虽仍简净利落,但取势大异。时有隶法,意态平和。折转之间方中有圆,提按之间断多连少,是其书体